

加入WTO: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 孙 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历经15年艰苦谈判后取得的里程碑式胜利,它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转折,也成为经济全球化获得新动能的重要节点。

(一)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1947年签署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GATT),中国是关贸总协定23个始创国之一,参加了第1、2轮关贸总协定关税减让谈判,在许多领域作出了关税减让的承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及历史原因,新中国不再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认识到,恢复中国的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不仅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化,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自1980年起,应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的要求,关贸总协定正式向中国提供关贸总协定文件资料;1982年11月,中国政府第一次派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第38届缔约方大会;1984年11月,作为观察员,中国获准出席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此后,中国每年都列席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大会,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原始缔约方地位的问题也逐步被提上日程。1983年1月国务院做出决定申请复关后,经过3年多的准备,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

关贸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中国开启了复关谈判的进程。

对于中国的申请,关贸总协定最初的反馈是比较积极的:先是允许中国代表团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许多活动,包括同意中国全面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列席技术贸易壁垒等6个委员会会谈等等,这有利于中国代表熟悉有关谈判环节和内容,增进相互了解。1987年3月,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决定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负责审议中国复关申请及相关问题,同年6月,瑞士驻关贸总协定大使吉拉德出任中国工作组主席,所有缔约方均可派代表参加工作组的工作。至此,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谈判程序正式启动,进入了有系统有组织的谈判阶段。

(二)

1987年2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这是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审议中国有关外贸制度是否符合加入条件的最主要文件依据。一般而言,审议完外贸制度备忘录是进行实质性关税减让谈判的前提。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自1987年10月起,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主要审议和讨论中国外贸制度。中国代表团对工作组及有关缔约方提出的2000多个问题进行答辩,答辩情况让缔约方比较满意,效果良好。在第4次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向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发出关税减让谈判邀请,要同时展开中国恢复缔约方地位和多边贸易谈判。到第7次会议后,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宣布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评估,决定从1989年7月开始举行第8次工作组会议,开始谈判中国复关议定书,即进行实质性恢复条件的讨论。到这一阶

段,中国复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欧美发达国家也乐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接受关贸总协定等国际制度规则的约束,中国复关形势似乎日渐明朗。但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复关态度发生逆转,它们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对华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复关谈判陷入停顿。

(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认识问题,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停滞了3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扫除了障碍。经中方努力,1992年2月中国代表团与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第10次会议,中国复关谈判得以重新启动并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到1994年时中国复关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不仅基本结束了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而且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议定书的框架也初步形成。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运作,7月,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观察员。1995年11月,中国政府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

1996年3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非正式多边磋商在日内瓦举行,两天的非正式磋商后,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随后开始双边磋商。当时,世贸组织共有135个成员,其中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成员达37个。仅1997年下半年,中国先后与新西兰、韩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等国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并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等国基本结束了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影响中国“入

世”的最关键因素。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推动中国“入世”进程,中国与美国开展了比较频繁的高层接触与首脑外交。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美,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加快中国“入世”谈判,争取尽早结束谈判;1998年6月下旬至7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与江泽民举行第二次高峰会并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1994年4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邀访美,中美商定于4月底前就中国“入世”遗留问题进行谈判,以便早日达成协议。1999年9月,江泽民与克林顿利用在新西兰出席APEC非正式首脑会晤的契机,就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释放出积极的政治信号。1999年11月,中美经过最后一轮艰苦谈判后,终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此后,中国又接连与马来西亚、拉脱维亚、瑞士、欧盟、墨西哥等达成协议,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当地时间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随着历史性的一声槌响,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全面履行WTO规定的义务,在不断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逐渐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适应者转变成应用者、引领者,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始终用实际行动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维护了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希尔达: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主义战士

□ 潘洪媛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前赴后继的国际主义战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命运与共。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即是其中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宋庆龄赞誉她:“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希尔达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义无反顾投身中国抗战救护事业,鞠躬尽瘁。

改善华人难民生活的活跃分子。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原名希尔达·爱丽丝·布朗宁,于1899年1月1日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塞文奥克斯市。希尔达在毕业后初入职教师时,就表现出对穷苦人民的关注,她选择了柏塞塞贫民窟的一所学校工作,以便获得对穷人生活的洞察。大约在1925年,她成为了一名全职活动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希尔达在英国工党内都从事组织活动。在1931年的克拉彭大选中,她代表独立工党竞选;在1934年的克拉彭竞选中,为独立党参加了三次选举,两次竞选伦敦郡议会的选区,一次竞选议会。在此后为苏联文化关系合作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塞尔温·克拉克博士(Selwyn-Clarke),两人于1935年结婚,第二年9月女儿玛丽出生。

1938年2月,希尔达夫妇来到香港生活,她的丈夫被任命为香港医务署署长。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提供医疗资金,改善中国最贫困人口尤其是难民的生活状况,支持中国抗战。据有关资料统计,1941年12月,多达75万人进入香港。难民数量的增加加重了香港长期存在的劳资问题,从而导致难民健康状况恶化。塞尔温·克拉克博士说服政府为难民提供营房,到

1939年1月,收容了约10500人的难民营已向难民开放,贫困的当地人和军事失败后的军队已经寻求到安全庇护。为了帮助改善难民的住房条件,在寻求政府支持同时,需要依赖于自愿组织。希尔达积极参与香港优生学联盟(Eugenics League),该联盟通过提倡工人阶级妇女实行节育来改善穷人的生活。在紧急难民理事会,希尔达担任其秘书,致力于解决香港现有穷人的痛苦,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穷人。

很好的助手和能干的组织者。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号召一批中共党员、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共同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西摩道21号宋庆龄寓所的小客厅里,保盟成立,宋庆龄担任主席,希尔达由她的朋友詹姆斯·贝特兰推荐参加保盟的工作,被任命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名誉秘书。在职衔前冠以“名誉”二字,就意味着他们虽在保盟工作,但不在保盟支薪或获取任何酬劳。保盟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希尔达在保盟的募捐活动过程中做了很多有益的义务性的工作。

希尔达是保盟香港委员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成员,她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做事果断干练。1939年初,为了募集救济物资及时运到西北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和希尔达亲自奔走呼吁。在香港维多利亚大教堂主教、香港天主教战时救济委员会、香港国际救济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负责人积极响应下,筹集了5万多元,购置了人民军队所必需的物品,装满救济物资的5辆卡车,经过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有力

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保盟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对外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呼吁援助中国。在“保盟”募集物资开展宣传工作的很多现场,希尔达充满热情地冲在最前沿,著名反法西斯女战士王安娜称其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妇女”,在“那群死气沉沉、贪婪虚荣的人的社会圈子里”“带来了一股新风”。在宋庆龄于1941年发起的保盟“一碗饭运动”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大律师为主席,希尔达担任副主席。7月1日的“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上,在宋庆龄发表激动人心的讲演后,希尔达对新闻界发表了诚挚热情的讲话,“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援助很热烈,中国人对中国的事业应该更关心,更积极地赞助‘一碗饭运动’。我们想一想,能让中国难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伸出诸位仁慈的手吧!去援助水深火热的人们!”宋庆龄和希尔达热情真挚的演讲,长久地回荡在人民心头,也有力地推动香港各界人士踊跃捐助。到8月1日止,各饭店捐助数已达14700碗。

宋庆龄对希尔达为保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于1938年5月25日给詹姆斯·贝特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发挥作用了。……我们也感谢你把赛尔温·克拉克女士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

代表中国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希尔达不仅是保盟的名誉秘书,同时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后援会的秘书。1938年夏天,希尔达专程赴湖南长沙考察中国战时救护情形。7月21日至23日,日军连续三天大举轰炸长沙。长沙“乃竟与不设防之广州同其命运,惨遭轰炸”,让希尔达愤怒不已。《申报》记者曾对希尔达进行采访,希尔达谈到了7月22日亲历的日

军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日机施炸之后,本人亲见斯瓦额墙倒压死伤之事件不可胜计,各医院充满可怕景象。孩提之童陈尸道左,重伤灾民喘息街中,此种行为,非兽行而何?”希尔达亲眼目睹大批的伤兵和难民云集。返回香港后,希尔达立即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国外援会,亲任秘书,后援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她的“双料”秘书身份,把保盟和红十字会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网,组织了能使医疗物资的运输穿越日军战线的复杂体系,大批援华物资、国际援华医疗队,通过后援会和保盟源源不断输送抗日前线。在此过程中,希尔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与她一起在保盟工作的詹姆斯·贝特兰所称道的:“她是唯一一个在香港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直代表中国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

希尔达坚守在她的岗位上保卫香港直到最后。日军进攻香港时,她加入医务工作者的行列。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她和丈夫双双被俘后囚禁在日军的赤柱集中营,受到日本宪兵的虐待和折磨。直到二战结束,希尔达获释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在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工作,继续对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进行人道援助。1946年,希尔达曾给周恩来写信,在周恩来给希尔达的复信中,赞扬了她“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将作出很大的贡献”。

1967年年底,希尔达在残疾数年后去世。这位没有加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以她的组织经验和医务总监夫人的身份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她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帮助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成为一抹别样的中国“红”。历史虽已远去,但她的无私奉献和满腔热忱的人道援助,将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李国伟,原名李忠枢,189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从震旦大学退学,后考取了唐山路矿学院土木工程科免费生,于1915年毕业。李国伟生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一生致力于民族实业,是以实业救国的典型代表。在新中国成立后,李国伟积极支持新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一)

李国伟最初就职于陇海铁路总工程师局,担任陇海铁路徐州段设计副工程师,后与著名实业家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后,于1918年开始从事实业,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中国近代实业少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民族工业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榨。在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国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减轻了对中国经济上的侵略,这就使得身处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实业获得了少有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中国尤以面粉和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发展迅猛,其中荣氏家族实业在这一时期表现突出,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效益一再提升。

1918年,荣氏委派李国伟去汉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厂,该厂于1919年投产,其出产的“牡丹”牌面粉,因质量优良很快打进国内外市场,获利丰厚,而规模不断扩大,5年后,其生产能力扩大了两倍,资金增加为4倍。至此,福新第五面粉厂已雄居华中面粉厂之首,在荣家12个面粉厂中也跃居第4位。

(二)

李国伟还投身纺纱事业。1920年筹建的申新第四纺织厂于1922年投产,但该厂经营并不顺利。最初,一方面资金不足,靠借债建厂;另一方面生产技术落后,在日本纱布低价倾销下,连年亏损,更多依赖福新面粉厂的盈利注入,勉强维持。李国伟一直努力改进该厂的生产经营状况。他加强申新第四纺纱厂的管理,废除封建工头管理制度,同时还亲自钻研技术以及聘请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革新。即便如此,该厂也一直难有起色,李国伟依旧顽强支撑。为了在日本纱布的低价倾销下维护民族利益,李国伟坚决拒绝了申新第四纺纱厂的出售。

在建厂后的几年当中,李国伟几次帮助申新第四纺纱厂渡过难关。如在1927年向银行抵押740万元才使企业维持运转,转危为安;1931年武汉大水,危及厂房,李国伟组织工人保住工厂;1933年申新第四纺织厂遇大火,在机器和厂房被付之一炬的情况下,先后增资400多万,以购买外国机器和礼聘工程技术人才,并培训专业管理人员,从而改进技术,加强管理,使工厂保持正常生产。在李国伟的坚持下,申新第四纺纱厂在困境中持续发展,到抗战前夕已经拥有纱机5万多台。

(三)

抗战时期,李国伟以极大爱国情怀克服各种困难办实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从东南沿海入侵,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方民族实业首当其冲。整个荣氏家族从近代以来积攒下来的多数实业也成为战火的牺牲品,而此时武汉受到战争冲击较小,李国伟所创办的福新第五面粉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生产经营兴盛。然而,随着日本侵略者向内陆尤其是向武汉一带的步步紧逼,形势也越来越严峻。

1938年8月,当局要求福新第五面粉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限期迁建,以躲避战火,保存实业,但遭到了一些股东的反对。李国伟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将福新第五面粉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迁至川、陕等大后方。在抗战期间,沿海工业区尽陷,在内陆地工业、商品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李国伟在大后方建厂克服了重重困难,费尽各种周折。经过艰苦努力,迁到重庆的纱厂不到一年就实现开工生产,成为迁入四川最早开工的工厂。面粉厂在几个月后也开工生产。这些企业生产的面粉和棉纱供应了抗战后方,对于缓解抗战物资缺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李国伟又在成都等地开设福新第五面粉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的分厂,还在宝鸡等地开设了宏文造币厂、陶瓷厂等,几年间,其业务拓展为机器制造、纺织、面粉生产、造币等。六七年间,李国伟在重庆、成



都、宝鸡等地拓建了20多家分支企业,为近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大后方发展经济、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更可贵的是,面对敌人封锁,李国伟自主研发制造出了纺纱机,解决了当时我国纺织技术严重落后的难题。

(四)

抗战结束后,李国伟所创办的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他用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丰厚财富,进一步投入民族实业。他从国外购买了一批先进纺纱机、面粉机、造币机和发电机等设备,进一步扩大生产线;在国内购进汉口怡和、新泰等洋行地产,这些举措使其产业进一步增大。

1949年元旦,新中国诞生,华夏大地百废待兴,李国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响应中国共产党投身实业的号召,毅然率领企业管理人员从香港返回武汉。

1950年元旦,李国伟携眷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副主席接见。从这时开始,李国伟积极参加国家工业振兴,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抗美援朝爆发后,李国伟在武汉市各界“爱国增产,捐献武器”的热潮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先后捐出亿余元(旧币)为志愿军购买飞机等装备,他也是武汉工商界中捐献最多的。

在社会主制度下,李国伟带头进行公私合营改造。1951年7月,李国伟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提出申请,要求宝鸡申新各厂和天水面粉厂实现公私合营,获中央政务院批准,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第一批实现改造的企业,在工商界起了带头作用。李国伟表示,这个愿望的实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新中国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时,李国伟全力支持。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后,李国伟代表申福新公司认购71亿元公债,其中李国伟个人的资产有28亿元。1965年,李国伟郑重地托请有关部门代其将这笔公债捐赠政府,虽然政府根据有关政策没有同意,但李国伟决心已定,最终还是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国家。为了表示这一决心,李国伟刻了一枚木章,在公债券上加盖“支援建设,永不兑现”字样。李国伟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倾力支持,成为民族实业家爱党、爱国的典范。

